

旧唐书选译

本书责编：张汝杰
封面设计：陈世五
版面设计：盛寄萍

·古代文史名著译选丛书·
(第一批50种)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巴蜀印刷厂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成都印刷一厂

1990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套

ISBN 7-80523-357-8/Z·27
定价：(50种) 130.00元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

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历时近三百年的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鼎盛的朝代。它不仅促使我国的封建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孕育出光辉灿烂有国际影响的封建文化，而且出现过唐太宗、武则天、杜甫、韩愈、黄巢等好些名知度高、对人们有吸引力的历史人物。因此研究唐史早就是中外史学界感兴趣的课题，想知道一些唐代的人和事也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

怎样了解呢？到唐朝故都也就是今天的西安来看一看，看一看博物馆里陈列的出土文物和碑刻，看一看附近唐太宗的昭陵、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还有唐玄宗和杨贵妃游乐旧地骊山，这当然不失为一个办法，今天西安成为中外游客向往的胜地就说明了这一点。但光凭这些旅游得来的知识总

会感到太零碎，要系统一点，详细一点还得依靠书本。书本中最简明的当然要推历史教科书，只是现在通行的历史教科书多数写得欠生动。《隋唐演义》之类的旧小说呢？生动是生动了，可和《三国演义》一样并没有完全按照历史事实编写；即使蔡东藩编写的历史演义，也和真的历史有距离。要了解真实的历史，或者进一步研究历史，还不能不读点古人纂修的内容详细的旧史书。这里给读者选译的《旧唐书》，就是其中较好的一部。

《旧唐书》是所谓“二十四史”里的一史。

“二十四史”者并非二十四个朝代的史书。而只是起自上古、下迄明代大体相衔接的二十四部史书。

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南宋时在以上十九史中去掉《旧唐书》、《旧五代史》合称“十七史”，以后加上《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在明代称“二十一史”，清乾隆四年加上新修的《明史》和过去的《旧唐书》一式刊刻成为“二十三史”，乾隆四十九年又加刻《旧五代史》成为“二十四史”，

并且都尊称之为“正史”。所以这么做，一是因为这些史书多数是由政府主持纂修即所谓“官修”的，有些虽非官修，也经过时间考验被公认为权威著作；同时，也因为这些史书的体裁都是所谓“纪传体”，这在旧史书中要算是一种最完善的体裁。称之为“正史”者就包含了以上这两层意思①。

这种体裁为什么叫纪传体？是因为它一般由“本纪”、“志”、“表”、“列传”四部分组成。这创始于《史记》，不过《史记》里不叫“志”而叫“书”，另外还在列传前多出个“世家”，到《汉书》把世家也写成列传，把书改称志，从此就一直沿用下去，只是有时候不修表，有时志也没有修，但本纪、列传总是有的，所以从唐人开始就称之为纪传体史书。

为什么说这种纪传体在旧史书的各种体裁中最为完善：（一）先看本纪，这通常也称纪，一个皇帝一个纪。唐代包括武则天在内先后有过二十一个皇帝，所以《旧唐书》里就有二十一个纪。这并非给皇帝们树碑立传，而只是以皇帝年号来纪年的编

①民国时又纂修了两部这样的纪传史，一部是个人纂修的《新元史》，经北洋军阀政府承认为正史，再一部是北洋军阀政府官修的《清史稿》。后来有人把“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或《清史稿》成为“二十五史”，也有把二者都加上去成为“二十六史”，但多数人还习惯用“二十四史”这个名称。

年史，而且所记载的都是国家大事，除开国皇帝或像唐太宗这种参与开国统一战争的皇帝讲一点没当皇帝之前的个人活动外，皇帝的个人生活琐事都不记，只是由于当时我国并未采用公元纪年，要记国家大事写编年史只能用皇帝年号来纪年而已。这种编年的本纪很有用处，依靠它才使我国保存了延续二千多年不间断的编年历史，其它编年史如《资治通鉴》之类在多数地方还得依据这纪传史的本纪。

（二）志，是关于礼乐制度、服饰制度、职官编制、法令纂修、财经设施等过去所谓“典章制度”的分类记述，此外，还分类记述了自然现象、地理区划、文化典籍等事项。如《旧唐书》就有《礼仪》、《音乐》、《历》、《天文》、《五行》、《地理》、《职官》、《舆服》、《经籍》、《食货》十个志。人们通过这些可以对当时的社会获得较为全面的了解。当然，记载这些典章制度的还有其他专书，但全面系统头绪清楚的仍得首推纪传史里的志，而且有些专书的编纂还得依靠志里提供的史料。（三）表，一般是遇到文字叙述不方便时用表的形式把它列出来。如《史记》的《三代世表》是表列黄帝到西周的世系的，《十二诸侯年表》是表列周和鲁、齐、晋、秦等诸侯国的大事，《高祖功臣侯年表》是表列汉高祖所封诸侯的兴废的，

《汉书》的《百官公卿表》是表列西汉中央重要官员的任免年月的。诸如此类，都能用简明的方式把有用的史料保存下来，尽管不便从头到尾去读，有需要时却可一查即得。但从《后汉书》起就都没有编写表，《旧唐书》也没有表，《新唐书》以后多数纪传史才恢复了表。（四）列传，也简称为传，占的篇幅最多，可以区分为“专传”、“类传”和所谓“四裔传”几部分。专传是给和时局有关系、有影响的重要人物立传，这倒不一定是将相大臣，将相大臣中关系不大的就不给立传。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排到一起立传，如《旧唐书》就有后妃、皇子、外戚、宦官、良吏、酷吏、忠义、孝友、儒学、文苑、方伎、隐逸、列女十三个类传。还有四裔传，则是给兄弟民族和外国立传，因为这些民族和国家都在四方边裔，过去习惯上称之为“四裔”。当然，除四裔传不专记人物外，专传、类传绝大多数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物，这就是所谓时代的局限，不能要求封建时代的史书纂修者来给劳动人民立传，但立了传的统治阶级人物也并非一味被歌颂，有时多少地指出他们品德上生活上有问题，有些类传如酷吏传、宦官传的撰写还都用否定的口气。更重要的是本纪所记载的国家大事一般讲得很简略，欲知其详多数时候

得参考有关的列传，再加上志提供了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表则可以用来补纪、传以至志的不足。这就是纪传体史书所体现的优越性，也就是过去有成就的史学家必须首先在纪传体史书上花功夫的原因。

这样详备的史书是怎样写出来的？凭个人的力量当然不可能。即使是《史记》，一般都说是司马迁一个人撰写的，其实大多数有现成的文献作为依据，而且他的父亲司马谈已经写好了一部分，司马迁再加以修订增补，是父子两代人合作。官修的就更复杂了，书上所题“×××等奉敕修”者，只是指此史书是姓“×”名“××”的宰相带领其他人奉皇帝之命（即所谓“敕”）纂修的，并非真由他动笔撰写，有的甚至只挂个名，从未过问纂修工作。这里选译的《旧唐书》就是这样的一部官修史书。书上题了“刘昫等奉敕撰”^①，其实刘昫只是在《旧唐书》修成时正好新任宰相，由他领衔进呈，于是在书上写了他的姓名。实际上真正主持纂修的是另一位宰相赵莹，他在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二月组成纂修班子，先后有张昭、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先、吕琦、尹拙等人参加，到后晋出帝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六月修成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一共二百

^①刘昫（xù）。

卷的《旧唐书》。只是修成时赵莹调到地方上做节度使去了，这个功劳才落到了刘昫身上。

当然，赵莹等人纂修时也是有大量现成的文献作为依据的，否则本领再大也不可能在短短四年修成二百卷的大史书。要弄清楚其中的究竟，还得从唐代怎样纂修“国史”讲起。所谓国史，就是指本朝的历史。我国很早就形成了一个好传统，每个朝代都及时纂修自己的国史，等改朝换代后就可根据已修好的前朝国史比较顺利地修成纪传史。这种修国史在唐代已做得很认真，制度也相当完备。当时在宰相的办公机构门下省设置二名起居郎，中书省设置二名起居舍人，分别记皇帝的“行”和“言”。所谓记行，是记以皇帝名义处理的国家大事，每天皇帝上朝听政时起居郎随同百官朝见，百官退出之后，皇帝和宰相议论国家大事，起居郎就在旁执笔记录，以后按年月日编成《起居注》。“起居”就是指皇帝的举动，“注”就是记载的意思。记言呢？当然也不是记皇帝随便说的话，而是指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命令，当时按不同用途有“诏”、“制”、“敕”、“册”、“赦”、“德音”、“批答”等名称，统称之为“诏令”，这些诏令随时由起居舍人在上朝时记录下来并加以汇总。每个季度终了时起居郎、起居舍人得把编写成卷的《起

居注》和诏令送进纂修国史的专职机构——“史馆”。此外，还规定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把纂修国史用得到的资料及时报送史馆，如各地发现所谓“祥瑞”由礼部报送，发现天文异状由太史局报送，兄弟民族和外国的情况由鸿胪寺报送，战争情况由兵部报送，变更音律新造曲调由太常寺报送，州县废置和各地旌表所谓孝义由户部报送，法令变改、断狱新议由刑部报送，丰收荒歉和各色灾害由户部和州县报送，封授爵位由吏部司封司报送，中央和地方高级文武官员的任命由吏部、兵部分别报送，刺史、县令有善政异迹以及州县里发现了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由考核人员报送，中央和地方高级文武官员去世由本部门、本州、本军报送，公主、百官去世后记述生平事迹的“行状”和赐谥的“谥议”也要报送，亲王入朝要由宗正寺报送，还授权史馆可随时行文给各部门索取其他用得上的史料。史馆本身则设置二至三名史官，通常由其他朝官兼任，有时也由起居郎兼任，名为史馆修撰，初入史馆的则名为直馆，后来又专称朝官兼任的为史馆修撰，非朝官入史馆工作的叫直馆，史馆修撰中又由一位官职较高的担任判馆事（即主持馆务的意思），上面再派一位宰相兼任监修。当时对史馆人选一般都经过慎重选择，如修过正史里的《周书》

的令狐德棻^①，修过《南史》、《北史》的李延寿，天文数学专家李淳风，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古文大师韩愈，以及徐坚、吴兢、韦述、林宝、裴廷裕等人，都是先后充任过史官的知名人士。

当时修成的本朝史有两种：（一）实录，是根据《起居注》和诏令之类修成的编年史，通常在皇帝身后才修，一个皇帝修一部。已修成的计有高祖、太宗、高宗、则天皇后、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一共十六朝的实录^②，其中有的由于政治原因修订改写还不止一个本子，剩下宣宗、懿宗、僖宗三朝没有修，昭宗和哀帝已是亡国之君也不再有人给他修。这种编年史所以叫实录者，是自吹在如实记录，这当然不会真有人相信，且不说史官们的阶级偏见，光皇帝或权臣们有形无形的压力，也会使事实在记录时受到歪曲。但所记大事的年月日之类总还是比较可靠的，而且内容也比较详细，在记载将相大臣或大名人去世时还要附上一篇小传，因此成为纂修国史以至后来纂修纪传体正史的主要依据。（二）是正式修国史，这是指修纪传体的本朝史，和所有正史一样有本纪、列传，还要有志。

①棻(fēi分)。②睿(ruì锐)。

本纪通常是根据实录改写，把次要的事情删除掉，大段的记述也压缩简练成一两句。志则主要根据各部门报送史馆的资料，列传可以根据实录里的大臣、大名八小传和报送征集来的行状、家传之类。最早在高宗时由令狐德棻修成这样的国史八十一卷，到玄宗时吴兢进而修改精简再加上续修的一共编成六十五卷，韦述在此基础上又增修成一百十二卷，外加“史例”一卷，柳芳又续修到肃宗乾元年间成为一百三十卷。同时柳芳个人还用编年体重写了一部《唐历》计四十卷，到宣宗时得到皇帝肯定，并叫宰相崔龟从等续修三十卷写到宪宗年间，实际上成为另一种编年体的国史。另外纪传体的国史在柳芳以后也还续修了一些。所有这些，都为后来赵莹等人纂修《旧唐书》作了很好的准备。

光凭这些自然还不够。一则肃宗以后的国史还没有编定，宣宗以后连实录也没有，再则经唐末的战乱，已纂修好的实录和史馆的其他资料还有散失。因此在后梁末帝时就提出征集唐人的家传，要求抄集武宗以后的公文奏疏送交史馆。后唐时又搜访凑齐了实录，只是武宗的实录残存一卷无从复原。另外还下令保护各地的碑碣，搜访宣宗以来的野史。到赵莹着手纂修《旧唐书》时，参加此项工作的贾纬也提供了他所编纂的从武宗到唐亡的编年